

書叢放解族民

聯蘇與中國

著等方治 之念



售經局書明光海上

書叢於解族民

聯蘇與國中

作著體集

書筆執

照天藍南亞王念潘
峰黃辛楚朱漢耕駱
業貝琛于傳方治孫

售經總局書明光海上

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前記

正當中國民族戰爭向前開展的時候，我們的友邦——蘇聯在舉行革命二十週年紀念了。爲着紀念友邦的革命節，爲着增進中蘇的友誼，今年我國的文化界一定有相當熱烈的表示。這本小冊子正是紀念十月革命節的一份小小禮物。

我們認爲當着友邦的革命紀念，最重要的是學習蘇聯過去完成革命與戰勝帝國主義的歷史教訓，認識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和平政策的真象，尤其重要的是促進中蘇在國際反侵略鬥爭中的交邦，使我們能和友邦親密地構成抵抗共同敵人的和平軸心，以捍衛人類的和平與正義。根據這種意義，在一次座談會中，我們決定用集體寫作的方法寫一本論述中蘇關係的專書。現在感謝各位朋

友的用力，這書是如期編成付印了。

關於研究蘇聯的專書我國出版界過去刊行了不少，但專門論述中蘇關係的著作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書的出來，或許多少可以使讀者認識中蘇兩大國家各方面的關係。在增進中蘇友誼助成中蘇反日更一進的合作這種意義上，我相信各位朋友的心血不會是白費了的。

平心 蘇聯革命廿週紀念日的前夕

目次

前記	一
第一章 中國民族解放戰爭與蘇聯	一
第二章 中蘇與世界和平	九
第三章 中蘇關係史畧	二一
第四章 中蘇關係與日本	三六
第五章 中蘇的經濟關係	四三
第六章 中蘇的文化關係	五一
第七章 十月革命的教訓	五九

第八章	外蒙古問題……………	六九
第九章	中蘇關係的展望……………	八四



3 0662 4929 7

644.8
775
3

第一章 中國民族解放戰爭與蘇聯

潘念



(南)

在二十年前，俄國的工農大眾推倒了俄國地主資本家的統治，消除了俄國帝國主義的精神，建立了無壓迫無榨取的國家——蘇聯。這一革命的性質是社會革命，其徹底的反帝國主義政策，表示牠是站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一方面。再加二十年來蘇聯為世界和平的努力，對於一切侵略主義者，不但給以精神上的制裁，也直接使其侵略行動受了威脅。所以牠的勝利不但是蘇聯一億六千萬人民的勝利，也就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勝利。

中國民族革命的主要目的在於打退國外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

雖然在社會體系及政治機構上說，與當時俄國的革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

在反帝反侵略方面，中蘇兩國却擔負着共同的任務。在今日，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的當前大敵，日德意所結成的侵略集團，也正是蘇聯的大敵，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民族解放不能完成，不打倒日德意侵略集團，蘇聯的和平，受着威脅。這利害的一致，勝敗的聯系，更在革命的性質以上，把中蘇兩國完全結合起來了。

實際上蘇聯對於中國的影響，並不開始於今日。當十月革命發生以後，蘇聯給予中國文化運動與民族革命的影響就很重大。一九一八年以後，中國思想界起了新的轉變，中國革命運動，有着新的躍進，自「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都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開展的。中山先生自述，稱俄國革命以後，他在國際上找得一個朋友，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毅然決定聯俄政策，於是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國民革命，便在正確的道路上迅速完成。此後十年，雖然因着國

際帝國主義的陰謀而使蘇兩國的政治上的攜手暫時停頓，而在思想文化上，中國人民大眾與蘇聯仍然是親密的朋友。二十年來蘇聯給與中國的影響是很深厚的。

今日中國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蘇聯仍然是中國最好的朋友，能給中國以最大的影響。這影響不僅指在經濟上物質上，蘇聯會給與中國抗戰以極大幫助，甚至在軍事上，將來蘇聯會與中國共同對日作戰，同時也表現於牠的外交政策上，因為蘇聯的指斥侵略，斥責日本，引起了世界各國的人民大眾對中國的同情；因為牠的活動，使英美的東方政策，轉為積極；因為牠參加了九國公約會議，使調停中日戰爭而解除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事受到了阻礙。如果世界沒有蘇聯，日本帝國主義也許早已無顧忌的吞食了中國，如果今日沒有蘇聯，英美等國也許絕對不敢向日本帝國主義稍加指摘，如果沒有蘇聯二十

年的存在，中國的民族革命也許不會進展到今日的程度。因為蘇聯的存在，世界形勢有完全不同的發展，對於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也就有完全不同的影響了。

然而蘇聯對中國解放戰爭的援助，決不僅在精神方面，在物質方面，在軍事方面，也必然可以實現的。因為蘇聯與中國聯合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為中國，也為着蘇聯自己，自然同時也是為着世界和平與國際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蘇聯根據着牠的主義和外交精神，固然應該援助中國的解放運動，而為保全牠自身的安甯，更必須打倒吞食中國之後而必然侵略蘇聯的日本帝國主義。不過蘇聯的武力援助中國，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實現出來。第一，牠不能因武力援助中國而引起英美等國的嫉忌，使和平陣線各國起了裂痕。所以在牠對英美的外交活動未曾完全成功以前，尤其在九國公約會議尙未有一致意見時

候，牠不便立即出兵。第二，牠不能因打擊日本而反促成了日德意侵略陣綫的圍攻，所以在歐洲方面的外交陣綫與國防未有充分佈置，或事實上已經無法避免日、德、意的圍攻以前，牠也不便立即出兵。第三，牠必須待中國確定了堅決抗戰到底的決心，執行着保障勝利的政策時，才能出兵援助中國，因為如果中國沒有抗戰到底的堅決意志，牠出兵參戰了，萬一中國中途妥協，反把戰事掛在牠的頸上，固然於人無利，於己有損；就是中國有抗戰到底的意志，但沒有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有所改革，使其適應於新的形勢，即沒有執行保障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策略時，牠也不會徒費力量來出兵助戰。第四，在上述條件完成以後，也必須在一定的協商下，即兩國訂立了正式的互助公約以後，蘇聯方才能實行出兵，否則不講一切軍事，政治的問題，不訂任何條約，只求其出兵出械，那是一件兒戲的事，不是一個健全的国家所能做的。

上述四條件中，後二條件比前二條件更爲重要，因爲目前的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終究是以中國爲主體，必須在自己像點樣，抗戰機構日益健全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他人的幫助。但到今日爲止，我們自己沒有確實把這二點做到。至關於前兩點的國際形勢，現在英美對於東方問題，尙未曾完全放棄對日本的幻想，就是還沒有願意蘇聯出來援助中國的意思；而德意兩國的活動却又顯然在拉攏英國，想造成圍攻蘇聯的陣勢。因爲這種種原因，使得蘇聯不能不有許多顧慮，所以到現在還未用很大的實力來援助我們，這真是一件可很扼腕的事。

但扼腕的事，未必就是絕望的事，我們如果明白得中蘇兩個一天不合作，日本一天不能打倒，中國民族解放，一天不能完成，我們就有決心去完成必要條件，以促成兩國的合作了。堅決的執行抗敵國策，迅速的訂立互助公約，固

然可以由我們自己來實行，就是國際形勢，也能因我們的主觀努力而轉變的，在我們的堅決抗戰和有勝利希望的抗戰中，英美的動搖態度可以穩定下來，德意的幫兇行爲可以不成問題，因着利害的一致，蘇聯應努力以促成合作的實現，而在自己的地位上說，我們更不能只抱着僥倖取勝的心理，而只責恨他人的不加援助。現在我們必須自己多努力一點的。

中蘇兩國的關係是十分緊密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生，不必諱言是受着蘇聯二十年來奮鬥成績的影響；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必待於蘇聯的合作；中國民族解放的完成，也足鞏固着蘇聯的和平政策。在如此緊密關係之下，中蘇兩國的切實聯合，是一個自然的趨勢，也是一個迫切的要求。同時在正開始着解放戰爭的中國，對於已經成功了的蘇聯的革命經驗也正需要學習。

在我們開始了偉大抗戰的今日來紀念蘇聯的建國二十年，我們提出了學習

蘇聯，聯合蘇聯的口號。在每一個救亡戰士讀完了這一小冊子以後，也必會更體驗得這兩個口號，要實現這兩個口號吧。

第二章 中蘇與世界和平

王亞南

一 一條侵略陣線與兩個和平軸心

在去年德意協定及德日協定相繼成立之頃，莫斯科新聞社論，曾有這樣一段議論：『希特勒組織所謂反布爾希維克集團之企圖，因德意及德日協定之締結，已開始實現於國際間，德意及日本外交政策之唯一推動力，乃絕頂恣肆的國家主義與狂瀆主義，侵略他國以擴大領土，乃至夢想支配世界。此所謂反共主義之口號，實為自欺欺人之假面目。』

這三個魔鬼兄弟在反共口號下，都抱着「擴大領土」及「支配世界」的企

圖。就法西老大哥墨索里尼說，他在劫奪了阿比西尼亞之後，還想對近東回教區進攻，且利用對奧匈的親善關係，向多瑙河流域發展，更製造西班牙內戰，以圖確立伊利伯安半島及西北非洲的勢力基礎，其最後企圖。則無疑是想變地中海為內湖，以復活古羅馬帝國。

黑花臉希特拉的志氣更不在小，東歐多瑙河流域萊茵河流域，那是他認為當然要畧取的。通過西班牙戰爭，而在非洲西北攫奪根據地，而向英法回索殖民地，在他猶為餘事，他必須囊括其國境北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更進而佔有了蘇聯的整個歐俄國土，然後才算實現了他理想中的第三帝國，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打算，比墨索里尼希特勒還要狂妄得多，「征服亞洲，必先征服滿蒙；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這是他的野心的最大胆的暴露。整個中國已在其宰割劫奪中，他並已在利用中國的資源和領土，南對印度南洋

等地，北對蘇聯，採取了有計劃的侵略步驟。在目前，這個迅速膨大的「大日本帝國」，似還比「新羅馬帝國」，或「第三帝國」更有「前途」。

不過我在這裏要講明的，不是這三個法西國家爲什麼抱有這種侵略野心，而是在它們分別實現這種侵略野心的當中，和平勢力能否或曾否予以制止。

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卽已登上羅馬的獨裁寶座，但他執行世界和平擾亂者的「大業」，却是近兩三年的事。因爲大黑花臉希特勒是在一九三三年登場的，墨索里尼利用希特勒在歐洲大陸方面的張牙舞爪活動，「輕易」成就了阿比西尼亞的征服；而在這前後，希特勒亦藉着墨索里尼的直接間接聲援，解除了凡爾賽條約課加於德國政治上軍事上的種種束縛。不過，到現在爲止，他們已有的成就，距離其上述理想，還是遙遠得很；而他們一年來在西班牙合演的侵略醜劇，則依舊毫無成績。這原因，並不是因爲他們的侵略活動，不够猛

進，而是因爲在歐洲早已形成了一個阻制他們侵略活動的和平軸心，換言之，即是因爲有了法蘇互助條約的存在。

事實上，德意協定的成立，雖然大體是由法蘇互助條約關係所促成，但以法蘇爲軸心而構成的西歐集體安全體系，却使德意有向遠東拉攏法西小丑日本之必要；同時，日本由「一九一八」事變以來所造成的國際孤立局面，却更需要依伴德意爲其聲援。於是，自去年冬季以來，這三個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已經實行結成一條侵略陣線了。假使自那時起，遠東方面已有像西歐那樣的和平軸心，由是形成一個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則當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規模侵略，和其對於整個世界和平的威脅，一定不會發生，至少是不會造成中國目前這樣的危境。

然則遠東或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將如何形成？其和平軸心，究將屬誰

呢？

二 惟中蘇可以結成遠東的和平軸心

遠東關係各國，除跌入侵畧陣線的日本，和利害關係較淺的法國外，其餘就是中蘇英美四國了。在這四國中，英美間的經濟利害衝突太尖銳了；蘇聯與英國或美國的社會政治立場太懸殊了；中國對英國或美國的關係，太不自然了；在某種場合或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國家，雖都可結合起來，成爲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但要上述這任一組國家，構成和平軸心，則不易實現，這正是遠東和平軸心迄今尙沒有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在這四大國中的中蘇兩國，却有種種理由可以協同担当起這種和平任務了。首先就消極方面來講：

第一、這兩個國家都沒有侵畧其對方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要求或企圖。在中國方面固不必說，蘇聯實行十餘年和平外交政策的結果，就在最不放心蘇聯的各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亦都承認蘇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第二、這兩個國家早已沒有不平等的條約關係存在。帝國主義的舊俄政權推翻，所有它過去在中國享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權，都由新政權取消了。此後所有中蘇兩國間締結的一切條約，都是建立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之上。

第三、這兩個國家並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那種經濟衝突事實存在。蘇聯是比中國還要地大和同樣物博的國家。有計劃的生產與消費的調節，其國外市場亦是不會佔有決定的作用的。而在外貨泛濫的中國方面，更是無從發現阻撓蘇聯經濟發展的痕跡。

就以上三點說來，中蘇兩國之間，在消極方面剷除一切合作的障礙了，而

況它們在積極方面，還有其緊密結成和平軸心的種種便利與要求。

以言其要求，則可從它們各本國立場與世界立場，分別解述。

(1) 就其本國立場言，蘇聯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中國亦在從事國民經濟建設，這兩種建設的性質及其前途，雖互不相同，但其對內對外需要和平，則無二致。

(2) 就世界立場言，我們當前的世界，雖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已經變了顏色，但其餘還是受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不得不在現階段，表現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姿態。所以世界的和平要求，必得加担在反資本主義，反侵略政策的蘇聯身上；可是蘇聯要擔當起這種任務，必得聯絡一個在某些方面比較容易與它合作的國家，它在西歐同法國結成和平軸心，就是基於此種事實；在遠東方面，它要成就同一任務，當然只好

選定中國合作了。

而況中蘇兩國在結成和平軸心的關係上，還有許多便利：

(1) 就地理環境上說，中國與蘇聯國境線毗連。中國由東北部的東三省，以至西北部的新疆，都與蘇聯爲比鄰，故蘇聯同中國結成和平軸心關係，較之它在西歐與法國結成的關係，當更加密切，更加容易維持了。

(2) 就歷史關係上說，中國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的國民革命運動，蘇聯曾盡了莫大的助力，聯俄爲孫中山先生所定的三大國策之一，中山先生的臨終囑，且特別表示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後，中蘇的關係，是頓改舊觀了，但這十年來的痛苦教訓，特別是近六年來遭受日寇宰割凌辱的悲慘歷史，已經使我們回味到中蘇聯合的利益了。至中蘇兩國人民由過去斷續友好關係所培植起來的共同信念與真摯情感，那是其他

任何關係國家所不能企及的。況且

(3) 就彼此利害關係上說，聯蘇在遠東方面的敵人，與中國當前最兇暴的敵人，祇是一個，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日本在每次侵略中國時，都一定要對蘇聯採取進攻的姿態；而且它在大規模侵略中國之始，還必定予蘇聯以試探的襲擊；等到侵略中國的軍事活動告一段落，立刻就表示是對蘇聯的攻擊前進了一步。這一切都說明中蘇如何應協同對付共同敵人，並說明在對付共同敵人的合作上，彼此該有如何大的利益。

三 惟中蘇互助協定可以挽救中國及世界的危局

這次中日戰爭爆發後，中蘇之間已經簽訂一種互不侵犯條約了。這個條約的簽訂，對於中蘇間過去的不愉快關係，當然有一大改進；至少，蘇聯對於中

國會迫而加入防共協定的猜疑，算是祛除了。

然而，在當前的局勢下，這樣一種消極性質的條約，究不够挽回中國迫在眉睫的危境，從而，也就不够挽回世界的危局。

三個月以來的戰爭，在上海方面，我們雖然把敵人的兇鋒挫滅不少，但整個北戰場上的戰爭失利，幾乎把黃河以北的領土，大部分給敵人佔奪去了。而且，敵人的五六十萬大軍，幾百架飛機，幾十艘戰艦，還繼續在中國各地方肆其侵畧與屠殺。

爲挽回這種危境，爲阻制敵人，我們除了動員全國大軍，與敵人拚死作戰外，並還在外交方面，向國際聯盟呼籲了，向九國公約各國申訴了。呼籲申訴的結果，雖然在最近，正在召開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關係國合作的北京會議，但這個會議的前途，却不但無補於中國目前的危機，而且還會加深那種危機的

程度。因為這次會議是以英美兩國為中心而召集的。根據過去兩週間英美兩國政府當局所表示的態度，就知道它們沒有制裁日本的決心，它們一再表示的「和平」，「調解」，其實就是強迫中國接受屈辱投降的條件。這種「調解」，在開始時就不免要削減中國的抗戰決心；「調解」有成，更將導來中國一種更悽慘更不可挽救的分崩離析局面。所以，在外交戰上，我們雖然大可利用北京會議，作為宣傳的舞台，作為活動的場所，但要挽救危亡，却得採取非常有效的外交途徑。

那就是進一步與蘇聯成立軍事互助協定。

不錯，與蘇聯締結這種協定，在內政上，勢須調整政治機構，動員全國大眾，使既成的政治勢力和社會關係，發生某種程度的變革；在外交上，更須把過去所走的英美路線，或對英美依存主義，畧加轉換。這是值得考慮的。但在民

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我們不但不應對於國內某一階層的意嚮過於遷就，就是對於英美各國的意嚮，亦不應過於依從。因為就前者來說，任何社會階層的利益，是要在整個民族危機得到挽救的情形下，才能真正保持的；就後者來說，最重實利的英美諸國對於中國目前的進一步接近蘇聯，雖難免引起反感，但等到中蘇軍事互助協定成立了，它們又必然會作一種適應新環境的打算。

總之，這一切都不值得我們過於顧忌，我們應以極大的決意，走向挽救民族危亡之路，和願意幫助並極能幫助我們驅除日寇的蘇聯，在戰線上攜起手來。中國由此得救了，遠東始有真正和平可言，而目前正待蔓延到整個世界的戰火，亦將受到有效的阻止。所以，中蘇軍事互助協定的結成，不但是中國存亡攸關的大問題，且為世界和平之所繫。

第三章 中蘇關係史畧

藍天照

一 蘇聯放棄帝俄時代的在華利益

蘇聯政府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成立後，即向世界各國人民提議：『樹立永久和平』。這種永久和平的根本條件，是否認外國的領土侵畧，強制合併，強制賠款等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根據這種精神，特別向東方各國發表宣言：聲明自動放棄沙皇時代的一切不正當權利。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五日，蘇聯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又發表一篇專對中國的聲明書。這個聲明書，是蘇聯推進對華外交關係的第一步，它在中蘇外交史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而且是最可紀念的文獻。此文坊間不多見，茲將其全文轉錄於後：以便留心蘇外交者參考。

「蘇聯紅軍，已由外國武力和金錢援助圖謀反革命的可薩克白色軍打破而入進西伯利亞，與西伯利亞的革命民族聯合提攜了。以此機會，蘇聯政府對於中國國民，特申同情之詞於左：

「蘇聯政府及蘇維埃紅軍，經二年間的惡戰苦鬥，跨過烏拉山向東方進軍，並不是爲侵畧誰人，也不是想侵畧誰人。我們的目的在何處，西伯利亞的農民和勞動者已經很知道了。

「我們對於東方民族，尤其對於中國國民，想脫離帝國主義武力和財力羈絆的運動，是很想與以援助的。我們不僅想救助蘇聯的勞動階級，並想援助中國人民。蘇聯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當初，已經有一通向世界的聲明

書；但這聲明書被日本及歐美的新聞紙隱沒了，不能達到中國人民目中，現在重新向中國國民宣言：

「蘇聯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俄羅斯政府權時，便用俄羅斯國民的名義，向全世界各國民提議「鞏固永久和平之設定。」這種鞏固永久和平的根本條件，是：否認一切外國的領土侵畧，外國民的強制併合及一切強制賠款。不問各國民的大小，不問他們所在何處，不問他們前此是否爲獨立國或反於他們的意思而被外國侵畧併合的：在他們的國內生活，須完全享有自由，雖以如何的權力不得強制的以他國國民加入自己的境域內。

『蘇聯政府並聲明：把俄國與日本中國及其他締約國間，所結的一切秘密條約，概行取消，——因爲這些秘密條約，是帝俄政府與其締約國協同壓制東方各國民，尤其是中國國民，以謀自己的利益的。』

『蘇聯政府當時已向中國提議：取消一八九六年的條約，一九〇一年的北京議定書，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條約，一九〇一年的北京議定書，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所締結條約的全部；並提議由俄國政府單獨的或與日本及歐、美列強共同的從速開始交涉，退還以前由中國所奪取的一切權利。到一九一八年止，蘇聯關於此事的交涉，繼續未已。當時因為協約國列強，壓迫北京政府並賄賂北京的新聞及大官，使北京政府對於蘇聯的交涉請求，一切與以拒絕。

『起初，由日本與協約列強奪取中東鐵路，侵入西北利亞，復又勾誘中國軍隊，參加他們橫暴的侵畧。但是中國工農對於歐美列強和日本爲甚麼要侵入滿洲及西北利亞的真意所在，並不能了解。

『現在我們再向中國國民宣告：帝俄政府由中國政府，在滿洲及其他地方

所奪取的一切利權，蘇維埃政府已經放棄了。對於此等地方的住民，須使他們自己自由決定他們的趨向。

『蘇聯政府，現第三回重新說明？放棄一九〇〇年的拳亂賠款。聽說對於我們前此聲明放棄了的賠款，列強公使，唆使帝俄政府時代駐北京的俄公使及駐各地的俄領事，又把牠收回去瓜分了。這些帝俄時代的駐外官吏，已被蘇維埃政府把他們的職權完全褫奪了。但是他們還是稽留在各地，由日本及其他列強的援助，欺弄中國的國民。中國國民明白了這種真相，應該從速將此欺騙者放逐出境。』

『蘇聯政府把俄國國民及中國的一切特權，——治外法權——也已經拋棄了。俄國的官吏和宣教師，不得干涉中國的國事。倘若他們敢於肆行，儘可把他們交移地方法庭，由法庭公平處分。在中國境內，除了中國國民自己的官廳

和法庭之外，不許有其他的官廳和其他的法庭存在。

『關於此等主要事項，及其他所有的中俄問題，蘇聯政府，切望與中國國民從速協商，把舊俄羅斯與日本及歐美列強對於中國所行一切強制不公平的行爲，永久掃去。』

『蘇聯政府，知道日本及歐美列強，對於我們此次聲明，仍舊是要用種種不合理的手段，將中國國民的耳目蒙蔽。我們要想把由中國奪取的權利，還付於中國國民，非先把盤踞滿洲及西伯利亞的列強勢力排除不可。所以蘇聯政府，一面向中國國民爲此聲明，一面派遣紅軍，跨過烏拉嶺，排除萬難，向東方進行，想把西伯利亞的同胞，從可薩克及其同盟國的列強手中拯救出來。』

『倘若中國國民，想作與俄國民一樣的自由國民，使中國免於「列強在凡爾塞和約」所定「印度第二」的命運；須先十分明白工農的蘇聯及其紅軍是中國

國民唯一的同盟者，唯一的兄弟們，除了他們，再沒有可以援助中國，爲自由而戰的了。蘇維埃聯邦，謹以蘇維埃政府之名，對於中國國民提議，請從速開始正式交涉，派遣代表，與我們的紅軍提攜爲幸。

右達

中國國民及中國南北兩政府

蘇俄外交總長代理加拉罕

這種坦率聲明，不僅反對外國的侵畧主義，而且對帝俄政府時代的侵畧政策也同樣反對。由此，帝俄政府侵畧中國所得的一切特權，便由蘇聯自動的表示完全退還中國。

二 中蘇北京條約

蘇聯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表聲明，願意立即開始中蘇談判。但當時中國北京政府，畏蕙無力，深恐歐美及日本干涉，總是不敢與蘇聯接近。一九二

○年，蘇聯爲促進中蘇外交關係，特派遼東共和國代表優林來華。他在北京住了半年，終無結果，廢然而返。一九二二年夏間，聯蘇又特派第一流外交家越飛來華。越飛到中國後，分別與北京政府和孫中山先生交涉。他在北京大受教育界及學生羣衆歡迎。他對於中國革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一則他居在北京的短期間內，從許多北方武人中，發見了一個具有革命性而可與蘇聯合作的馮玉祥。他在上海與孫中山攜手，又促成了國民黨的聯俄容共的計劃。這是越飛在華的最大成績。假使他不爲病魔所侵，他能够長住中國，將於中蘇二國關係，也許更有增進。可是不幸他中途害了不治的重病歸國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政府復派加拉罕來中國。他一到北京便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這原因，是由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五日及一九二〇年十月廿七日，蘇聯二次發表對華宣言，都是加拉罕署名的，中國人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而

良好。所以，他到北京不久，便能够排除列强的妨害，而與我國開始交涉。

我國政府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明令王正廷爲中俄交涉督辦，與加拉罕進行交涉，於是中俄談判，便正式開始了雙方屢次談判的結果，直延至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始擬定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十五條，及暫行管理中東路協定草案十一條。三月十六日，王正廷與加拉罕將此草案簽字。此時大家都以爲中蘇國交可以增進，中國承認蘇聯不成問題了。不料，當時外交總長顧維鈞突然提出異議，政府不能照准簽字草案，而加拉罕則以爲業經雙方簽字的條約，不能再有更動，於是便起爭執。一時空氣緊張，中蘇談判頗有破裂之勢。此時國內人民紛紛埋怨北京政府，坐失時機。同時奉天和廣東又分別與蘇聯磋商，恢復外交關係，因此北京政府大起恐慌，不得不繼續與加拉罕接洽。五月廿九日顧維鈞和加拉罕會見，正式商定草約，卅日經北京內閣通過，於是

有名的中俄北京條約便正式成立，中蘇二國正式邦交也從此開始了。茲將此約要點，摘記於次：

第一、本協定簽字後，兩國立即開始正常外交關係。

第二、兩國政府同意將以前帝俄時代所締結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根據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蘇聯政府宣言之精神，重訂協定。

第三、蘇聯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第四、兩國政府互相担任，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行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

第五、蘇聯允許拋棄帝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租界及庚子賠款等項特權及特許。

這個中俄協定，完全本平等精神。中國政府把以前帝俄所侵畧的損害，完全收回了。這個協定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開了新記錄。

中俄協定訂立後，因奉天方面持反對態度。加拉罕鑑於協定之履行，非與東三省當局協商不可。乃暗派代表赴奉天與張作霖接洽，經過多次交涉，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於奉天又密訂『奉俄協定』，此協定內容，大體偏重於中東路事及邊界問題。

三 國民政府時代的中蘇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是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來到中國以後才具體進行

的。一九二三年一月，越飛因往日本養病，過上海時，與孫中山先生會晤，兩人談話結果，甚為融洽，於一月二十六日便聯合發表一篇宣言，聲述中蘇二國的一般關係，以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等事。越飛由上海赴日本時，孫先生派廖仲愷同往。他們二人在熱海同住，經過長時間的密談，關於蘇聯實際援助中國革命的具體事項及設立黃埔軍校等，曾有廣泛的決定。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蘇聯命鮑羅廷來廣東。廣東國民政府便正式聘請鮑氏為高等顧問。鮑氏由莫斯科帶來的使命約有二大端：一為計劃黃埔軍校的創設，二為完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工作。鮑氏運用其過去參與援助土耳其革命的經驗，很快的就把這二個任務實現了。於是中國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及擁護農工農利益這三大政策之下，革命勢力，飛躍發展。不僅廣東革命基礎，穩固如山；而且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後，不到半年，便直搗武漢江浙，把

揚子江以南的舊軍閥完全掃蕩了。

不幸，革命勢力正在一日千里的發展中，於民國十六年四月間，南京忽有清黨事件，國共合作因之破裂。六月十七日，武漢政府也通過免鮑羅廷及各俄顧問職的議案。到七月十五日，更正式通過取締共產黨案。至此，鮑氏等乃於七月二十七日全體離開武漢，經過河南、陝西、蒙古而回莫斯科。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便完全破棄了。由於這一政策的放棄，不僅革命勢力爲之頓折，而且十年來不斷的內戰，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都由此造成。到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共產黨暴動後，南京國民政府認爲蘇聯領事館有煽動指示的嫌疑，十四日晚南京乃發出正式照會，撤消蘇聯在華領事館及一切國營機關。但此時華北及東三省的蘇聯領事和商業代表，還沒有撤消。及至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因中東路糾紛發生後，中蘇二國才正式宣佈絕交。

中、蘇絕交以後，隨即發生軍事衝突，滿洲里及同江等先後失陷，局勢非常險惡。南京方面鑑於事態重大，乃派員暗示東北當局，相機進行交涉。張學良遂派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與蘇聯領事接洽。隨後在伯力談判，成立伯力會議草約十項。一幕軍事衝突，至此才算停止。但中蘇二國仍舊在絕交中。

九·一八事變生後，因我國備受日本壓迫，人民對於恢復中蘇邦交之要求，十分迫切。同時，蘇聯方面亦深感日本勢力侵入滿洲，西伯利亞頗受威脅。中蘇復交事，雙方都感需要。於是經過數月之交涉後，顏惠慶與李維諾夫談判成功，就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宣佈中蘇二國恢復正常外交關係。

最近數年來，關於中蘇商約事，曾不斷談判，但仍無甚進展。直至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中日進入全面戰爭後，中、蘇二國外交關係，才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始於八月廿一日正式公佈。但這不侵犯條約，仍是消極性的，我們希望中、蘇二大民族，爲共同抵制世界法西斯主義者，能有更進一步的合作，趕快成立「中蘇互助公約」。

第四章 中蘇關係與日本

路耕漢

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了不少，而且還談到它的歷史，不過這些還是不夠的。因為誰都知道，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而且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經過第一次大戰而又迫近第二次大戰的沒落時代，在這時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真是空前地複雜，矛盾和緊張，假使要想瞭解這一國家跟別一國家之間的關係，就非從整個國際關係的觀點出發不可；所以我們要澈底瞭解中蘇間的各種關係和任務，我們也就非把眼光投到整個世界不可。

不過世界這樣大，國家這樣多，我們從何處去把握呢？我們是不是每個角落都要巡歷到呢？我認為這是用不着那麼機械的，事實上只要我們能够把握住

其中的重要環節，也就够了。按中蘇兩國間的關係而言，日本就是整個國際關係的重要環節之一，它值得我們加以充分的注意。

爲什麼呢？這有兩大原因可言：

1. 日本與中蘇兩國在地理上都極接近，中蘇兩國的政策固然會很快地影響到日本，而反轉來，也完全一樣；所以要深究中蘇關係，我們就必需相應地深究日本對中蘇兩國的政策。

2. 中日之間與日蘇之間有着兩大基本矛盾：一是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對立；一是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這兩種矛盾不是各不相干的，而是極端複雜地錯綜着影響着，而且還含有世界性的意義。所以從這關係出發，我們假使要進一步地研究中蘇兩國間的關係，也非牽及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環節不可。

本來中蘇兩國間的關係必然是親密和友善的；因爲對世界而言，尤其是對

日本帝國主義而言，在許多點上兩者的利害都是一致的。譬如蘇聯爲了它的社會主義建設所最感到威脅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國爲了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所最感到窒礙的，也正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敵人既然相同，利害自然一致了。蘇聯過去願意協助中國不是沒有根據的，中山先生主張聯俄當然也不是歷史上的一種錯誤。不過中蘇兩國一天天地親密起來，在帝國主義看來，當然是極大的禍根，所以它們必需設法反對，挑撥和破壞。在這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是最賣力的一個；因爲它很知道：中蘇兩國是會把它當作最大的共同敵人對付的。本來友好的中蘇關係過去曾一變而爲齟齬，而且還經過一個長的時期，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

日本帝國主義不但陰謀地來破壞中蘇間的友善關係，而且還陰謀地藉口反

蘇防共來蒙蔽世界，來併吞中國（這兩者本來就是分不開的）。六年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的時候，它說是爲了進攻蘇聯，近來它進而併吞華北，又說是爲了防止赤禍南下和赤禍北上；但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却只有中國九省和一萬萬六千萬同胞的淪亡，和眼前日本軍閥在中國各地的慘無人道的屠殺。這不是藉口反蘇防共來滅亡中國又是什麼呢？

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是很明白的：假使不將中蘇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截斷，不使中國國民政府敵視蘇聯，它是不可能吞下中國這塊肥肉的，而且進一步，它自己還可能從帝國主義的寶座上傾覆下來。所以過去松室少將在他給關東軍的祕密情報中，就一再力說「斷絕中蘇之聯絡，切斷共同抗日之戰線」；和這相應，日本對華的外交政策，不論內閣如何更易，總是死死地咬住廣田的三原則（其中之一，即爲共同防共），使在實際上能遂行它的大陸政策。可是不幸地

是以往數年間，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毒辣的陰謀，在中國竟會見了實效！

不過，從這兒，我們也不要生出這樣的誤會，以為中國要保全領土的完整，要收復失地，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非全部依賴蘇聯的友好關係不可。假使這樣想，那我們就未免太輕視自己的力量了。我們的意思只是說：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點上，在求得中華民族之徹底的解放上，蘇聯是我們最可靠的友軍，它可能給我們以種種助力，我們不應輕信敵人的讒言而將它放棄，甚至當作死敵來反對。有人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它會吞沒我們，殊不知這正是敵人的讒言。試問：它吞沒了我們什麼呢？東北四省呢還是華北？又有人說，蘇聯的體制和我們不同，我們不宜和它接近，這無形中也是在那兒替敵人盡挑撥的功能：因為那怕它的體制跟我們兩樣，它和日本帝國主義總是千真萬確地互為死敵，我們不去和它接近，難道反而應該和我們的敵人去親善嗎？

山先生的偉大就在他能够毫不猶豫地突破帝國主義的這些陰謀，堅定地用聯俄政策來使它的遺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行動起來，所幸現在敵人的真相已經暴露無遺，全國上下亦在中山先生的偉大遺教之下行動起來了！

末了，我們還向全世界的人士宣言，中蘇兩國間的好友關係，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之中再生起來，這件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固然是大打擊，但是對於全人類却是一大福音。誰都知道：太平洋自遠東的警犬狂吠亂咬以來，早已不太平了，它不特威脅着太平洋沿岸各國的人民，而且還威脅着世界各國的人民。這樣的危局如果再繼續和擴大開去，對於全人類當然不是一種幸福，所以我們必需設法制止，而要做到這點，主要就要靠中蘇兩國聯合起來。以往因為中蘇兩國的離異，英美兩國又表示猶豫觀望，以致日本帝國主義得在太平洋上橫行霸道起來，並進而擾亂全世界的和平。現在中蘇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再生起

來，對於太平洋上的集體安全當然會有巨大的貢獻，我們希望世界各國的人民都來爲這歷史巨作而努力！

第五章 中蘇的經濟關係

朱楚辛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總數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蘇聯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面積佔全世界的六分之一。這樣衆多的人民，這樣廣大的土地，兩個國家的邊界又緊接在一起，照理它們之間的經濟關係應該是世界上最頻繁和最密切的兩個國家吧。可是，事實被歷史條件所限制着，今日的中國與蘇聯，他們還只能算是很疏很疏的遠親。

這原因，首先可說是，中國所以走上世界經濟的舞台，完全是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強迫拉上的，在帝國主義國家裏面，如果誰的勢力最強，並且誰拉的最狠，那麼中國就會投在誰的懷抱裏。蘇聯的前代祖宗，是一個最野蠻的舊俄帝

國主義，可是當它（舊俄）形成帝國主義的時候，已經是十九世紀末葉，英法各資本主義國家也差不多已經成人長大了。等到它的羽毛豐滿一點時，整個資本主義可說已經顯出衰老，百病齊發，而它自己經過一番災難後，也就脫胎換骨，變成今日的蘇聯。

一個保有十足封建遺毒的落後的資本主義，侵畧姿態雖然特別顯得貪饞，可是經濟武器究竟是微弱的，所以舊俄和中國雖早已有通商關係，但比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來，並不佔有很顯著的地位。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舊俄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百分比，還只有百分之〇·七八。就是大戰前幾年，那是中俄貿易的最盛時期，也還只佔百分之七·三五。

舊俄對中國的投資，在歷史上曾經開過奇異的花葩，一九〇二年幾佔各國對華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三一·三，一九一四年時也佔百分之一六·七。但誰都知

道的，這花葩是一種移花接木，舊俄不過是高利貸帝國主義法比的一位捐客。

革命後的蘇聯，已經不是帝國主義了，它雖然需要國外通商，但它並不需要強迫性的侵略。所以它把過去舊俄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廢棄，把許多經濟上的特權自動取消，並且歸還給中國了。經過數年的國內戰亂和國外帝國主義的干涉，國內生產事業幾經破壞，國外貿易也就大減，在中蘇經濟關係上於是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最低點——一九二〇年的中蘇貿易一落千丈，幾乎只佔中國貿易的百分之一·八四。

新經濟政策以後，蘇聯經濟逐漸恢復，中蘇貿易在一九二四年又開始轉變，此後因為中國國民革命勢力的蓬勃，政治條件更使中蘇經濟關係猛烈的向前推進，於是一九二六年的中蘇貿易即超過戰前水準（八千六百萬兩），一九二八年且造成最高紀錄（達一萬一千八百萬兩）。但不幸，一九二九年中蘇

邦交發生障礙，於是貿易數字又一直往下直瀉！

革命前的俄國，因為負着法比帝國主義的掮客的任务，所以它在中國的投資數額佔老二的地位，它只次於老大哥英國，佔座位於日德之前，然而革命後的蘇聯，在華投資却已一落而為第三位了，它所佔的百分比，當一九三一年時只有百分之八·四（一九〇二年為三一·三；一九一四年為一六·七）。並且，這投資，因為蘇聯國內政治經濟的基本條件與前迥不相同，所以它的內容也大異其趣了。

革命後的蘇聯，已經把中國一八九五年的四厘金借款和一九一三年的善後大借款取消了，這兩筆借款，到一九三〇年底止，總數在一千三百萬美金以上。同樣的，庚子賠款項下的債務，也已無條件的由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協定取消，蘇聯對這許多債權的放棄，是其在華投資數額所以減少的原因之一。

一九三〇年時的蘇聯，總計在華投資數額尙有五萬三千萬盧布以上，但是事對上其中一萬二千萬盧布爲私人投資，這許多債權者，完全是革命以後逃亡到中國來的白俄，所以據 C. F. Remer 說：「這羣產業主，從政治方面說，他們是一羣可謂沒有國家的流民，從經濟方面說，他們的國家是中國，」所以這一部份投資，差不多並無利潤或紅利滙回到蘇聯去的事情，因而這投資和一般帝國主義國家，在殖民地敲取骨髓到宗主國去的情形也有些不同。而且，五萬三千萬中有四萬一千萬屬於中東鐵路，該路現已被迫出讓於日本，所以目前蘇聯在華投資可說已到完全沒有的程度。

因爲蘇聯並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它需要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它沒有失業工人；它的工農生活一天一天在改善，它也不會感覺到商品和資本過剩，因而也不需要向海外尋求超額利潤，敲骨吸髓的剝削弱小民族，所以它的國內社會

經濟日益發展和對華投資數額日益的減少等現象，同時發現，一點也不會感覺着矛盾。

可是，目前究竟是一個世界經濟打成一片的時代，國際貿易的衰落，總表示着是一種經濟倒退的現象。所以中蘇貿易關係的不能發展並且顯示衰退，這一定有以造成這種病症的惡魔在，這惡魔，就是盡人皆知的，自命反赤警犬，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與蘇聯在通商關係上可以說有四條交通大道：第一條，是太平洋各口如海參威等處直通我國本部，第二條為經黑龍江各口通東北數省，第三條為由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通新疆及外蒙，第四條為由黑海與歐俄奧得薩等處。這四條通路是中蘇貿易的必經之途，假使失去其中的一條，中蘇貿易必然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中國輸往蘇聯的貨物，佔着首位的是茶，其次要算是荳類，而蘇聯輸入中國的主要是煤油、木材和印花布。假使誰給我國的茶和荳類以打擊，那末我們的對蘇輸出就會大形減少，同時，誰如以煤油和印花布等來猛烈競爭，那末，蘇聯輸華的貨品也必然要受到影響。

按理有這樣四通八達的通路，有如此地大物博的領土，並且，有這樣信用健全的顧主，真的，中蘇貿易應該是一日千里。可是，相反的，惡魔扼住我們的咽喉，搶去我們的領土。

我國的東北淪陷已經六年，中蘇的第二條通路已被敵人攔住，我國的荳類唯一產地也被霸佔，所以中蘇貿易從一九三二年起就一落千丈，一但一落千丈，並且從前世紀起一直到現在，六七十年來的歷史傳統——數一數二的出超，也一反而爲入超了。

中蘇貿易的減退，有許多人以蘇聯國內提倡植茶事業來解釋，因而結論爲中蘇貿易絕無廣泛發展的前途。而其實，蘇聯在沒有廣事提倡植茶以前，中國的輸出也已被日本和錫蘭茶等所排擠，相反的，在去年，蘇聯曾經有以煤油向中國現物交換茶葉建議的消息，但被我國加以拒絕了。這指明，國內政治機構對於經濟發展的障礙和促進，也與帝國主義的勢力能夠發生同等的作用。

從歷史上看，蘇聯在經濟上是最有利於中國的，（因爲它是中國對外貿易出超的國家，）而且是唯一站在平等地位和我們建立經濟關係的國家，從它的發展前途看，蘇聯有全世界最大的領土，最完善的經濟制度，然而可惜，中蘇經濟關係到今天，由於我國內外的種種障礙，未能走上理想的境界，這確是一件相當遺恨的事情，今天我們應以最大的努力除去這遺恨才是。

第六章 中蘇的文化關係

黃 峯

蘇聯建國二十年以來，它的文化是璀璨得奪目的，其成就，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是像巨人般的矗立在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殘壘的對方，爲世界的大衆所看到，所震驚，所迎受。一切的謠詠都淹埋不了它，一切的貶詞都中傷不了它，巨人始終是巨人，倒是那造謠中傷它的一流人物，越顯得像侏儒一樣，小得可憐了。

假如我們肯細心地加以考察的話，我們不難知道中蘇文化的新的接觸，是遠在俄國革命的前夜。這不僅是因爲中蘇兩大民族，在地理上是接壤的，尤其顯著的，却是因爲兩大民族的人民大衆的遭遇頗有相似之點。十九世紀末期的

俄國文學，首先在中國境內——自然，在歐美也不是例外——發出了偉大的光輝，托爾斯泰、朶斯托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訶夫，一穿上了中國裝，立刻使我們感到了親親切切的、善良的靈魂的嘯拂，使我們體驗到了彼此都在忍受着的辛苦和掙扎，使我們明白了彼此都是被摻取和被壓迫的大衆。我們愛好俄國文學以及俄國文化，比愛好英美的文學和文化還來得熱烈。我們認識安特列夫、阿志巴綏夫、柯羅連柯、高爾基，比認識英國的狄更斯、梅萊狄斯和哈代來得清楚，也比認識美國的亞倫·坡、霍桑和奧·亨利來得深刻。這在俄國革命之前是如此；在革命之後，也仍然如此。

到得俄國革命之際，以及革命之後，則它的文化和文學的傳入中國，更挾着一種傾山倒海的勢力而到來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有人把許多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介紹了進來，開始撒下了社會主義的種子。從俄國革命文化的教

訓中，我們獲得了可寶貴的革命政策。例如「以民族爲形式，以社會主義爲實質」的民族文化政策啦，從軍事、封建的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可行性啦，民衆力量的組織技術和運用方式啦，都是蘇聯的革命文化的寶貴經驗，使我們從血的教訓中獲得了鐵的信念：知道我們的新文化建設是不能單靠我國固有的文化來完成的，我們正需要新的內容——在過去是反帝、反封建，在目前是抗日、反漢奸——來栽培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在基本政策上，我們不但是可以拿這種新文化來扶植弱小民族的文化發展，而且可以跟各個弱小民族和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團結一致，以完成全民族的解放。其次，蘇聯的經濟革命，從最落後的階段躍進到最前列的地位的這種可能性，給我們這經濟落後的中國以莫大的刺激。至於蘇聯對於民衆力量的組織和運用，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上，更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因此也就產生了輝煌的文化。

我們的新的文化教育，大半都是從蘇聯來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許多的文化工作者，開始介紹了蘇聯革命的理論成果，尤其是一些基本的社會科學讀物，潮一般地湧流進來。雖然，在這一時期的讀物中，不少「左」傾的托洛斯基派的毒汁，不少「右」傾的德波林，蒲哈林和普列哈諾夫等作家的機械論和錯誤分析，但一般地說來，這些讀物顯然是於中國文化界有益處的，——益處多於害處。

文學方面，由於幾位忠實的翻譯者——曹靖華、魯迅、蕭參等等——的努力，蘇聯的各種名著，如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里別進斯基的一週間，以及格拉特珂夫、梭羅訶夫等人的作品，都在岩石似的環境之下生長出來。這里所謂「岩石似的環境」，可以借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明。他說：「在近十年中，兩國（中蘇）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却不因

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里却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蘇聯的文學，——社會科學也一樣——不論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之下，總是像地泉一樣湧流着，向中國的深處不斷地湧流着，不過有時是明顯些，有時却隱暗些吧了。

中國語文拉丁化運動，是中國整個文化運動中的基本的一環。這一運動，在去年一年之中，進展是非常迅速的，主要的原因，不消說是因為新文字（即

拉丁化的別稱）本身是中國大衆教育的唯一工具，也因為工作者的努力給與了這一運動以充分發展和擴大的機會。但我們要知道，中國語文拉丁化運動，並不是從去年才開始的，而是，遠在五六年來，莫斯科研究院就首先提出中國語文的拉丁化問題來。據莫斯科日報所載，研究並解決了拉丁化問題的各種方案的，是科學研究院裏面的東方學院。到了一九三一年，在海參威，伯力，赤塔，莫斯科等處，東方學院和中國工人和學生，曾有多次的討論；隨後，在海參威的一個關於中國語文拉丁化的會議中，開始提出了一種新的字母。由此，中國的新文字字母，便被採用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工人的教育工作上面，至於向中國的發展，那是幾年以後的事。

還有一件大事，在中蘇文化關係上盡了相當的力量，這就是去年六月間，中蘇文化雜誌的創辦，它使我們在文化上漸漸地愈形接近起來了。

現在是我們發動着抗日的神聖戰爭的時候，現在是蘇聯與中國已經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我們相信，抗戰中的文化將更其發揚而光大，是勢所必然的，而俄國當時的反抗十四國的武裝干涉，尤其是反抗日帝國主義的進攻中產生的文化鬥爭，是我們在抗戰時代的最好的借鑑。他們在抗戰中動員了民衆的力量，擴大了工農的文化，採取了革命的游擊戰術，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現在我們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比當時的俄國要優勝，要雄厚，我們只要抗戰下去，我們的勝利便不是空口的談話，而將是事實的表現了。他們的國防文化，國防文學，對於我們的抗戰，都是存在着無限的價值。列寧說過，革命的軍隊即使退到堪察加，也還是要抗戰到底的。斯達林說過，我們不願奪取別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願把自己的一寸土地拱手送給別人。這種抗戰精神，正是我們目前必須接受的文化財富。在此後的日子中，中

蘇兩大民族文化的交流，必然要成爲鐵一般的凝結：從互不侵犯到互相幫助，從外交的密接到文化的攜手，我們要爲着爭取這一前途而努力！

第七章 十月革命的教訓

孫治方

十月革命給與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教訓太大了。

因爲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建立了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那裏，正在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然而，十月革命給與我們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教訓更要大。

因爲，十月革命發生在經濟落後、農業人口佔優勢的俄羅斯。十月革命雖

則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在這以前，先經過了長期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先有同年二月革命的勝利，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以及一九〇五年以後的近十年的黑暗的反動時期。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更有無數次大規模的原始的農民暴動。十月革命是這些勝利的和失敗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底直接繼續。十月革命固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寶貴教訓，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勝利也有許多教訓可以讓我們學習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的俄國還是一個半農奴制的專制國家，二月革命推翻了貴族地主領導的沙皇政府的統治，然而二月革命並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土地革命。但是二月革命的主要意義却不在這革命的本身；而在於它成了十月革命的序幕，在於革命運動並未停止在資產階級民

主義革命的階段上，而急轉直下地踏入了第二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二月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直到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才到了澈底的解決。

我們也曾經有個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年的大革命。我們也曾經推翻了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在表面上革命是勝利了。然而我們沒有能夠解決我們的革命的中心任務：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和根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問題。所以在本質上，我們的革命只能比之於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換句話說是失敗了。這原因就在於我們的革命還沒有達到最後的勝利，就在這階段上中止了。

一九二七年的俄國二月革命爲什麼不會中途夭折，而能直接「轉長成」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呢！這裏除了種種客觀的原因以外，主要的原因對是革命性最澈底的工農大衆成了革命的主力軍，使得別的社會階層的動搖或退出革命，不

致於牽動到全局。所以爭取工農勢力的發展和他們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之取得是爭取革命徹底勝利的主要保證，也是十月革命給與世界革命運動的第一個教訓。

俄國本來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度，產業工人在全國人口中比較佔少數；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小資產者。這本來是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弱點；然而俄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因為能夠運用正確的土地政策，却把這個弱點變成了革命勢力的最大泉源之一。革命前，俄國的農民處在地主貴族的半農奴制的束縛下，他們需要解除這束縛，更需要耕種的土地。貴族地主當然不能成為農民的解放者，不能給他們土地，資產階級也只能給他們一些口惠，而不能實際上滿足的要求。然而無產階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號，給了農民們自由，更給了他們土地。這樣就把千百萬農民大眾團結在革命的旗幟之下，增厚了革

命的勢力，也就是孤立了革命的敵人，而使無產階級成了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俄國的多數黨所以勝利的關鍵，也是少數黨、社會革命黨以及托洛茨基派所以失敗的原因。澈底解決土地問題，是保證十月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也是十月革命給與世界革命運動的第二個教訓。這教訓對於我們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更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中國是更落後的國度，農業人口在這裏佔人口中絕對大多數，所以土地問題的解決和農民大眾的動員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更具有決定的意義。當然，土地問題的解決方式在革命運動發展的每個具體階段是並不完全一致的。例如，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階段，以沒收土地來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是不適用了。

俄羅斯帝國是一個包括民族最多最複雜的一個國度。在革命前的俄羅斯帝國，民族問題是它的一個弱點，然而它却成了十月革命的另一個力量的泉源，

成了今日的蘇聯所以如此鞏固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羅斯帝國的一萬萬七千萬人口中，大俄羅斯民族還不到七千五百萬，其餘一萬萬左右的人口全是被壓迫民族，換句話說，全是俄羅斯帝國的敵人。十月革命把這些民族解放了起來，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繼續尊重革命的民族政策，而且在事實上履行了這些政策，於是這一萬萬左右的被壓迫民族（除了少數上層份子以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擁護者，成了蘇維埃政權基礎之一。十月革命所標榜的和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所遵守的民族政策的內容，簡言之就是：大俄羅斯民族放棄自己在非俄羅斯民族所居住的各區域內的一切『權利』和『要求』，事實上承認這些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些民族與俄羅斯民族可以自主的訂立軍事經濟聯盟；援助落後民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發展（沒有這種援助，那麼所謂『民族的平等』只是一句空話）；徹底解放各民族中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份子，把土地和政權都交

給他們，同時，蘇維埃政府更在事實上證明自己對於『民族自決』這一基本原則的忠實；例如承認了芬蘭的獨立，撤回了駐在波斯的遠征軍，放棄了在中國的一切帝國主義特權等。所以民族問題的徹底解決是十月革命勝利的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十月革命給與世界革命運動的第三個重要教訓。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曾經說過：『壓迫其它民族的國民是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的，』在這裏也可見俄國革命家對民族問題的重視程度了。中國國內的民族雖沒有蘇聯那樣多而複雜，然而民族問題却是當前抗戰期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敵人正在利用我們國內各民族間的不大圓滿的相互關係，來挑撥民族糾紛，分散我們的抗戰實力。我們在今天更應重申孫中山先生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革命主張，並以革命精神在事實上履行這政策。

十月革命給我們的教訓是太多了，我們要把些教訓都舉出來，那簡直是舉

不勝舉。總之，俄國十月革命所以能够勝利，就因為俄國的革命的階級及其政黨，尤其是它的領導者處處能够了解大眾的最迫切的要求，並且能够採取適當的革命政策，來滿足這些要求。祇有這樣才能使大眾熱烈地來擁護革命，而革命的政黨和他的領袖才能成爲千百萬大眾的革命領袖。

例如，十月革命中，除了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以外，民衆還要一個更迫切的要求便是和平。於是爭取和平或對德與休戰，便成了俄國革命者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在今天的中國，和平也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一致的願望，因為他們的和平生活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破壞了。然而這和平却不能以對日休戰來求得，反之，只能抗戰才能恢復我們的和平生活。所以，在中國任何政黨，任何政治家要得到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擁護，就應該領導他們進行徹底的抗戰。

列寧是俄國革命的領袖。因為他能够了解大衆的要求，而且能够提出最適當的政治口號來達到這要求，所以俄國的革命大衆都擁護列寧做領袖，而列寧自己也最能信任革命大衆。每到革命的危急關頭，列寧便向大衆說話，要求他們起來支持革命。例如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要求俄國軍隊的總司令向聯盟國軍司令提出議和，並且下令部屬停止軍事行動。但是總司令拒絕了這要求。於是列寧便利用無線電向國內的和外國的人民和士兵直接發表了革命政府的停戰宣言。這樣不僅中止了前線的戰爭，而且推翻了俄國總司令。列寧是常常用這種戰術來同他的政敵作戰的。

十月革命勝利後到今天已經二十年了。革命後的蘇聯又經過了四年多的內戰（一九一七年——二一年）。國內經濟曾經完全被破壞。可是內戰結束後蘇聯勞動者即以極快的速度恢復了自己的國民經濟。到了一九二八年就已經恢復

了戰前的生產力。此後，又經過了兩個五年計劃的努力，才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度改造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工業國度。蘇聯在這十餘年來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建設中，當然更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以做我們的教訓。然而在這裏，我們最不應該忘記的教訓便是：今日蘇聯的勝利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以一九一七年的勝利的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爲前提的。沒有二十年前的十月革命便不能有今日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不久以前，有許多人當着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畧軍隊佔領了我國一半版圖，當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剷除封建殘餘的民主主義運動未達到勝利之前，（即在政治前提不存在的場合下，）奢談國民經濟建設，都是忽視了十月革命的這一重大教訓。

第八章 外蒙古問題

傅子琛

一 問題的提出和解決

我們遇見過許多關心中蘇兩國關係的人，以及討論中蘇關係的座談會或文章，往往把外蒙古問題認為是一種重大的懸案，甚而有時把它當做一個難以解決的「謎」。第一是由於大家對外蒙古的真象不大明白；第二是由於中蘇兩國對外蒙古的態度，沒有被普遍的認識清楚。尤其在最近，在中國抗日救亡的緊急時期，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以來，一般人更把對於外蒙古的視線集中起來了。有的人「希望中蘇兩國當局，很乾脆地馬上把外蒙古問題解決下來，」以便

『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有的人『鑑於日僞軍的積極對外蒙古挑釁，甚而進擾到內蒙和華北、華中、華南來了』，『希望外蒙古出兵，展開抗日戰事』。有的人又認為『外蒙古根本背叛了祖國』，對於外蒙古表示『痛恨』，『懷疑』，乃至『失望』……關於這些現象，不問一般人的動機和立場怎樣，總是表示着外蒙古問題，已經很迫切的需要解決了。

究竟怎樣解決外蒙古問題呢？我們以為：第一不應該把事情看做一個不可思議的『謎』；第二應該很切實地認識事實的真象；第三不應該用封建主義或帝國主義的意識來看問題，而應該從中國民族解放的立場，來看問題；第四不應該把外蒙古看成一塊死的東西，而要從它的活生生的本質，去認識它。首先要把握着這幾個觀點，然後才可以客觀的去解決問題。

雖然，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知道蘇聯與中國的當局，究竟要怎樣解

決外蒙古問題。但在學術的或一般時事的研究中，我們切不可等待或馬馬虎虎的『不了了之』。問題固然是要由事實的發展來解決的；同時真理總是要大家努力去把握，才可以出現的。

我們以爲，外蒙古問題，沒有什麼神秘，只須從蘇聯與中國對外蒙的關係，及外蒙古自身的情形來說明，即可以得到解決的路綫。下面照着這個要點，依次的討論下去。

二 蘇聯對於外蒙古的關係

蘇聯對於外蒙古的基本態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的時候，就根據反對帝俄侵畧主義的宗旨，發表『一切民族自決』的宣言。這個宣言，實用於外蒙古的情形，跟蘇聯對待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是一樣的。

也許有人懷疑，說『蘇聯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擅自與外蒙古訂立互助公約，』那豈不是『蘇聯也承襲帝俄政策，侵略外蒙古，損毀了中國的宗主權』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必用空口來討論，只須把帝俄對外蒙古的條約與現在的蘇蒙互助公約比較一下，就明白了。

帝俄在沙皇統治下面，曾經屢次慫恿外蒙獨立，企圖轉變外蒙為它的殖民地。在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沙皇派參贊官廓索維慈與庫倫的活佛王公，訂立俄蒙條約，其中主要的內容是：

(一) 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現已成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國兵隊入蒙古邊境。

(二) 蒙古政府，准俄國人民及俄國商務，照舊在蒙古領土內，享用此約

所附專條內開各權利，及特種權利。

(三) 蒙古政府，如須與他國訂立新約，不經俄國允許，不得違背此協約之規定。

我們可以說：俄帝國主義與外蒙古的活佛王公所訂的這個條約，是一種毫無折扣的侵略契約。但是，現在試把一九三六年三月成立的蘇蒙互助公約的主要內容，來比較看看，兩者更是黑白分明的一個對照了。蘇蒙互助公約中，主要的，有這樣幾條：

(一) 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如受第三國家或政府之攻擊威脅，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應立即共同考慮發生情形，並採用防衛及保全兩國領土所必需之各種方法。

(二) 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締約國之一國受軍事攻擊時，

相互予以各種援助，包括軍事在內。

(三) 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締約國中一國軍隊，根據互助公約，為完成第一條或第二條之義務起見，屯駐另一締約國內，至無此必要時，應立即退出，有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之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此乃不言自明。

很顯然的，蘇聯跟外蒙古的外交關係，跟對法國，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同是爲了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要把這個關係，從國際上講起來，還是爲了保障世界和平，可以說是和國際聯盟所有原則，恰相符合的。不過，有人說：『蘇聯擅自與外蒙古訂立條約，是損害了外蒙古對中國的宗主權』。關於這個主張，在蘇聯方面，認為根本不成問題。因爲，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蘇協定的第五條中規定過：『蘇聯政府，承認外

蒙古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而且，第四條中更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該協定簽訂後，中蘇國交，卽行恢復。以後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在這樣的精神之下，也異常之好。雖然後來中蘇有數年間停止往還，但蘇聯對外蒙古的關係，一直沒有什麼傾向於侵略性的變化。這種現象，不是表面上的說明，可以弄清楚的。惟有從蘇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及外蒙古自身努力完成民族解放的事實，才可以解說明白；也惟有從中國民族解放的立場上，才可以理解其中的關係。

三 中國對於外蒙古的關係

關於中國對外蒙古的關係，除了一般人以不負責的「不了了之」的態度，

與避嫌疑，不肯「具體討論」的態度之外，大體可以分爲兩個主張。第一種，是因襲着滿清專制帝王的封建傳統思想，始終把外蒙古看做「藩屬」。這種主張，根本認爲「外蒙古背叛了中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北洋政府的徐世昌總統，因蘇聯宣佈「放棄帝俄在外蒙古的特權」後，經活佛王公的接洽，承認外蒙古「歸政中國」。徐氏當時即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督辦外蒙古的政務。這種事情，本來應該對外蒙古有利益的。但是，徐樹錚帶起大兵，專心在直隸省京畿地方，爭權奪利。僅只派了一部分軍隊到外蒙古去，除了向蒙古人民作威作福之外，連活佛王公也承受不起督辦給予的德政和恩惠。到一九二一年外蒙古受白俄謝米諾夫的反革命軍隊的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之下，把外蒙古弄得混亂不堪了。於是，中國的長官和軍隊，就潰散回來了。此後，北洋軍閥所傳留下來的對於外蒙古的觀念，總是認爲失掉了「納貢抽稅」的地

盤，是抱恨的事情。一直到了今天，許多富於封建專制帝王思想的人，還是憑着這種觀念，在着外蒙古問題。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而且必然是自取煩惱的，簡直是時代落伍的思想。所以，一切具有這種觀念的人們，無論是怎樣愛國、愛民族，乃至具有何等『高尙』的心理，始終沒有實際的辦法，把外蒙古『收復轉來』。

第二種對於外蒙古的主張，跟第一種是完全站在反對地位的。這種主張，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所指示的：對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內，『扶植各弱小民族』，『獨立』『解放』。根據這個主張，國民革命曾經順利的展開，目前救亡運動，更因之廣大的發展到一切弱小民族的身上，造成中國民族解放最有利的條件。這種主張，對於外蒙古問題，沒有空想的毛病，更沒有反動的封建帝王思想的惡劣意味。它既不空想把

外蒙古強迫變成『藩屬』，又不妄想外蒙古『繳納年貢』；只是無條件地，希望外蒙古，從封建的，專制的，及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

根據這個宗旨，孫中山先生的偉大遺教，國民政府在最近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已經成功了。同樣的，根據這個宗旨，對於外蒙古的關係問題，當然就只有開明的，合乎進化法則的辦法，來解決一切了。

不過，這種偉大遺教的運用，決不是一句空話，或斷章取義，即可以成功的；必須在中國全面抗敵戰爭中，在神聖的反侵略者的澈底運動中，才可以逐步的實行起來。許多人在最近熱誠地『希望外蒙古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出兵打擊日偽軍政勢力』。我們以為：這並不是幻想，而是一個可能的事情。但這種可能性，必須中國政府與民衆，用堅決持久的抗日戰爭，才可以促其實現的。

四 從外蒙古的本質來看中蘇關係

在前面（2）（3）兩節中所談的結論，是說明中蘇兩國，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場和反侵略者的立場上，對於外蒙古的問題，是採用同一的政治路線的。要順利地解決外蒙古問題，只有從堅決廣泛地抗日戰爭中，才可以獲得正面的解決。

現在，剩下來的問題，是外蒙古自身，是否會在蘇聯與中國之間找着妥當的或同一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要外蒙古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軍事的情形，來說明它是否與侵略者不安協，而站在我們民族解放的戰綫上來？關於這點，事實已經有堅實肯定的答覆了。

有人曾經傳說：外蒙古「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是靠不住的話。一

九三四年外蒙古國務總理恩托宛氏，在第七次國民大會中，指出：這是『左翼政策的謬誤，是空想外蒙古入於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他說：『現在外蒙古却非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在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因建設逐漸進行的基礎，而成爲新型民族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反封建的第三階級的民主主義共和國。』

事實上，外蒙古的社會、經濟、文化及軍事的情形，在現在這一階段，確是正在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現在，一切封建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由民族自決的民主勢力所代替了。

牧畜業是外蒙古經濟上最重要普遍的經濟部門。在一九二四年革命以前，封建貴族及喇嘛佔有全外蒙古的家畜數的大半。到一九三五年以後，王公貴族所霸佔的牧畜業，幾乎絕跡，喇嘛的家畜，連佔全部的百分之一都不够了。而

且，整個外蒙古的家畜數，在一九二四年爲一三、七七六、一一九頭；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二二、三七四、八〇〇頭。平民每一個平均的經營單位的家畜，在一九一八年爲六十頭；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一一五頭。這可以說是財富大約增加一倍。這種飛速的進步，主要的是掃除了封建的剝削，經共和政府提倡改革經濟的結果。

一九二四年喇嘛寺院佔有四千海克脫（一海克脫，約合華畝一七·五）的農耕地面；一九二九年減爲七十海克脫。一九三六年以來，國立農場及集體農場，已經普遍於各地。機械化的農具，也日益增加。政府還要貸給農民以農具和種子。人民取地耕種，三年免征糧稅。

工業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在外蒙古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但自革命以來新建設的，有機械、木材、製革、酒精、煤礦、汽車、製鞋、麵粉、煉瓦及印刷

等工廠。資本總額，在一九二七年初爲三一八、〇〇〇蒙圓（約合華幣七分之四）；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五、八〇五、〇〇〇蒙圓。勞動時間，現在已完全實行八小時制，比較舊蒙古時代，每日十七八小時的奴隸勞動，真是天上地下的對照。

外蒙古商業，在一九二四年僅有四、一四六、〇〇〇蒙圓的經營；到一九三四年已經增加了十幾倍。在同時期內，金融力量增大了十二倍以上。交通也在十幾年之內，從原始的而進步到現代的汽車、鐵道、電話、電報、航空的設備。

這些嶄新的發展，證明了外蒙古的社會關係，已經擺脫了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束縛，並非吹牛。

至於文化教育方面，自採用新文字拉丁化，實施普及教育以來，外蒙古

青年已經沒有不識字的了，庫倫根本找不着文盲。一般的報紙雜誌、演講會、電影、劇場，體育館、俱樂部、以及公共衛生設備等，在舊蒙古所沒有的文化教育建設，在革命後誕生的新蒙古，却已見慣不驚了。

外蒙古軍隊的技術，已經完全是現代化的。而且他們的政治水準特別高於一般民衆。常備軍雖只有十幾萬人；但因民衆的軍事政治訓練，與對於軍隊的合作，很有教養。所以，一旦有抵抗侵略者的戰爭爆發，八九十萬新蒙古的人民，是一定會起來，執行全民抗戰的任務的。

從上面的一切事實看來，外蒙古的確是新型的，勝利着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先鋒。這一本質上的說明，可以保證，只要中國與蘇聯聯合起來，抵抗侵略者，爲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爲世界和平與正義，爲民族解放，而抗戰到底，外蒙古畢竟是要屬於我們的！

第九章 中蘇關係的展望

貝 葉

蘇聯自十月革命後，基於社會主義的政綱，及國內建設的需要，外交政策一貫是和平的。他不但不侵略任何弱小鄰邦，而且還用種種手段扶助他們。遠的且不說，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時，疾呼集體制裁的不是蘇聯嗎？德意法西斯圖謀佔領西班牙的陰謀，不是遭受到蘇聯有力的揭發與阻撓嗎？在中國，不但首先放棄了一切不平等特權，並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予以軍事，政治和物質上的種種幫助。前次國聯會議召開，李維諾夫的演說，予侵略者以露骨的解剖，并力爭對侵略國譴責的決議；此次九國公約會議，蘇聯代表的演說詞，又給侵略者以難堪，我們相信，在這次會議中，因了我們抗日的

堅決，蘇聯的援助，再加英美本身的利益，英美的態度是不完全會不利於我國的，美國說，不得中國同意的解決方案，決不贊助，正是一個明證。同時，在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是在多方設法與美國握手，透過美國的關係，而拉攏英國，法國不成問題的是和平陣綫的一員，這樣來建立，鞏固和平陣綫。這種苦心，是和強盜們的侵畧計劃不同的，是傾得贊許的。

明白蘇聯外交的本質和歷史，我們可以相信蘇聯確是世界和平，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最主要支持者，與愛好和平，抵抗強橫的我國，是在一條綫上的！

但，中蘇關係并不止此。兩國的文化是早已交融，兩國的政治，從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奮鬥革命來求解放，走上自由的道路，也有相似之點，兩國的人民都願意把社會推到新的階段上去。假使，日本多佔中國一塊土地，也更逼近蘇聯一天，日本毀滅了中國的文化，政治，也將影響到蘇聯的文化，政治；

同時使蘇聯人民少一個前進的朋友。

中蘇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早該有進一步的合作。可是，五年以前，中蘇斷絕邦交，互爲仇敵；民國廿一年雖復交而不合作，這是很可惜的。幸喜，抗戰掃除了國內矛盾，也開始建立了新的外交，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才得在今年九月廿一日簽字。

但，這條約明明是消極的，是非常不夠的。爲什麼我們在軍事抗戰已延續了三月多的今日，還不與這樣好的朋友深切的合作呢？中蘇互助公約爲什麼到現在還不簽訂呢？是蘇聯不願幫助我國嗎？這我們從蘇聯的內政外交看來，都可證明是不會的，所以責任還是在我國。雖然，因抗戰而減少了國內的矛盾，可是並不是說國內的矛盾已消滅了。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抵抗侵略的勢力與主和親日的勢力間，永遠隔着一條鴻溝。中蘇互助公約不曾訂，對日寇暗送眼

色的，就是這批傢伙在那兒搗蛋。

在如此現狀下而言和平者，大約有兩種人。一種是主張投降的親日派，一種是希望英美出而調停，使戰事早日結束的妥協派。前一種人不成問題的是漢奸，後一種人雖主觀上不是漢奸，而客觀上却也幫助了日寇。可不是嗎，日寇想佔住華北休息一下，英，美爲了自己利益出而調停，這明明是不利我國的，但他們却在一旁呼應起來。具體事實的反映是李思浩·陳覺生·曹汝霖公開在京滬活動；對日絕交的阻止；民衆運動的不放胆開放。這些現象是够令人痛心的，這現象繼續下去，中國的前途是太黯淡了。

我們要民族國家得到澈底解放，獨立自主的外交是得建立的。與日絕交是不成問題的重要，倚靠英美也是太危險。英國動搖不定，看侵略者臉色說話的滑頭外交，早斷送了阿比西尼亞，又便利了德意法西斯與弗朗哥。對中國，

雖不致完全和對阿比西尼亞問題，西班牙問題一樣放縱侵略者，可是，只要日本不過份違害他的在華利益，他是不惜屈中國讓步藉此休戰的。美雖比英較好一籌，可是美國的金融家軍火商與日寇結下不解之緣，政府對日政策的強硬，是會遭受到阻礙的。中華民族要想跟着英美，走到解放的路上去，實在是天下難事。老實說，中國的澈底解放一定會刺激英美統治下的殖民地大眾，他們壓根兒是不願的！

前面已經說過，蘇聯因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條件，是我國比較可靠的友人，也是最能顧及到中國利益的友人，是不成問題的了。好轉了的中蘇關係，是不是能走上更急切合作的道路，完全要看我們自己怎樣。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抗戰到底，不妥協，不軟弱，那麼蘇聯的政府和蘇聯的全國大眾，給我們以友誼的援助實決無疑義。如果我們先存着妥協的心理，不願意求

抗戰的澈底勝利，那麼中蘇關係在表面上雖再好些也是無用的。不過中途妥協雖爲親日份子和主和份子的努力中心，事實上却很少可能，因爲英勇的戰士，廣大的民衆，都已經明確的知道，現在時候要是中途妥協，結果是滅亡，是自已把殖民地的頭銜永遠戴起來，向侵略者乞憐，他們是決不允許這樣做的，所以中蘇的關係，必將因中國的澈底抗戰，而續繼向密切合作的道路上發展。

民族解放叢書
中國與蘇聯

著者 谷方·奈之等

主編者 平心

發行者 民族解放叢書社

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光明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特約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再版

每册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578
321683

14. ~~578~~
75

.15